



你一定要听听“臣光曰”

——读《丁万明评说〈资治通鉴〉之纵横捭阖》

□ 赵新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资治通鉴》被誉为资政第一书，司马光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写作宗旨，本着“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价值判断标准，对1362年十六个王朝的成败得失作了详细的品评。其“臣光曰”更是成为历代史论中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象征礼治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的“三家分晋被合法化”这一事件，成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卷“豹头”，响亮而沉郁，从而迸发出统摄全书的第一篇“礼”字当头长达千言的“臣光曰”。《资治通鉴》300万字的宏大叙事实际上是司马光为主张礼治而搜求的历史铁证，也是司马光以自己的礼治思想剪裁出的千年治乱图景，而它的解读者正是长于政治伦理研究的丁万明，他与司马光穿

越时空的对话能产生共振的奥秘就在于此。

“臣光曰”有三种：其一，狭义的“臣光曰”。指司马光亲自动笔撰写的119条“历史评论”。其二，中义的“臣光曰”。指包括司马光征引前人撰写的99条“历史评论”。其三，广义的“臣光曰”。包括《资治通鉴》全部的历史记述，它们几乎全部是“臣光曰”的潜台词并为司马光“出庭作证”。

可以这么说，一部《资治通鉴》其微言大义就蕴含在“臣光曰”中。而《丁万明评说〈资治通鉴〉之纵横捭阖》（以下简称《纵横捭阖》），围绕评说“臣光曰”做了以下三件事。

巧设楔子引出“臣光曰”。相映成趣的是，《资治通鉴》的开头是“三家分晋”，《纵横捭阖》的开头是王荆公和司马温公“两公争雄”。这个漂亮的楔子，向人们讲述了从北宋王朝的困局中抬起头来寻觅前路两个风云人物，“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昔年知己，因为“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而争得面红耳赤。要国富还是要民富？要“渐进改革”还是要“激进改革”？“两公争雄”

的结果，是王安石争来了改革的“操刀权”，司马光争来了著史的“话语权”。司马光离开热闹的政治舞台而深居洛阳躲避小楼成一统，身处“独乐园”，心存“庙堂忧”，那日子想必不是太好过。而此时的王安石，身处风口浪尖，日子也不好过。最终，北宋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也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文章憎命达”，令人一叹。

古为今用深化“臣光曰”。《纵横捭阖》截取了战国那一段狼烟风片，随手翻开一页仿佛都能嗅到那个时代呛人的烟火。作者用大量笔墨讲述了列国改革家们的传奇，他们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凄壮的祭坛，而隐藏在祭坛背后的是一个贯穿千古的“二难命题”：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旧的不可爱，新的也未必如愿。

“臣光曰”守望礼、名、分主张“不变”，王安石放言“三不足”主张“变”。“臣光曰”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社会怎么向前飞奔，总有一种叫乡愁的东西如影随形，我们甩不掉也变不了。那就是“礼”。如果我们把“礼”作为社会规范、伦理准则、道德风俗、法律法规，这个经过现代性转换的“礼”还是

要经常讲。

实事求是校正“臣光曰”。清白而朴忠的司马光不是完人，狭义的“臣光曰”未必都正确，广义的“臣光曰”未必无纰漏。于是需要实事求是的“校正”与校勘。作者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保证了狭义的“臣光曰”能够与时俱进，广义的“臣光曰”能够去伪存真。商鞅徙木立信的目的，历来评者如云。作者则列举了三种观点：立信、立法、立国之道。其中，“臣光曰”持第三种观点，把徙木立信解读为注重信誉的治国之道。作者认为这是“过度阐释”，并提出第四种观点，认为商鞅此举的主要目的是“立威”。

广义的“臣光曰”难免在“历史记录”上有出入和纰漏，甚至错误。对此，作者大量采用了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比如，关于吴起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三桩大罪，结合最新研究资料，为吴起辩诬。司马光考异了十七史，丁万明考异了“臣光曰”，异代相隔虽渺渺，两心同构却戚戚。

史学漫谈



□ 王兆贵

风云际会多奇才

每当一个强盛的王朝走向没落之际，都会出现群雄逐鹿、问鼎天下的动荡时期，狷介狂放、特立独行的奇才怪才，也就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或者说，从来承平少狂士，自古板荡多奇才。那么，动荡年代为何能多出人杰奇才呢？

动荡年代的艰苦环境，为人才的诞生起到了砥砺作用。不经浴火，何来重生，不经苦修，何来高就。与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承平岁月相比，动荡年代的读书人，颠沛流离，心境凄苦，很容易激发图强求变之志，更加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习与求证、世道人心的剖析与批判以及治世方略的筹划与施行。他们或者像终南隐士那样，结庐山林远离纷争，苦心孤诣著书立说；或者像先秦诸子那样，讲学树下，设教授徒，或者像苏秦、张仪那样，发愤求学专攻术业，游说诸侯合纵连横。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应该是对苦难造就英才的最好注脚了。

动荡年代的社会变革，为人才的成长冲破了精神牢笼。在动荡年代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随着道德伦理的倾覆、思想观念的碰撞、秦汉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上层建筑摇摇欲坠，社会大变革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就为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提供了思辨的现实样本。他们在敏感中痛苦着，在痛苦中思考着，在思考中求索着，或是破旧立新，离经叛道，或是秉持祖训，墨守成规。这就搅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死水，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大师级人才也就纷纷脱颖而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如此，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而这些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催生了一大批呼风唤雨的仁人志士，这是和平岁月无可比拟的。

动荡年代的人才需求，为人才的致用提供了历史舞台。动荡时期的雄主，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不惜以高规格的礼遇募四方精英为己所用，既为那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干才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那些“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学者开设了经筵之席。

战国时期田齐创立的稷下

学宫，兴盛时期曾汇聚了多达千人的天下贤士。这里既是学术争鸣的高等学府，也是智库性质的谏议机构。孟轲、淳于髡、申不害、邹衍、田骈、荀况、鲁仲连等，都曾在此传经布道，建言献策。春秋战国时期，不惜代价招募天下贤能的历史记载很多，如燕昭王筑黄金台、战国四公子养士以及秦国广揽外籍人才的客卿制度等。与此同时，以建言献策成大事的旷世奇才就更多了，如，一番出使便策动齐吴晋越五国有变而保全鲁国的子贡，“五论救弱国，妙语退秦师”的烛之武，被称为“连横之父”的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不辱使命捍卫齐国国格与尊严的晏婴等。人类学家克罗伯曾感叹说，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难道真是因为他们怕孤独而结伴扎堆的吗？其实非也。若没有奇才成长的气候和土壤，怎么可能会有群英荟萃呢？

动荡年代的群雄割据，为人才的辈出留出了自由空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强权争霸无休歇，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样的情势下，只要你能纵横捭阖，说服四座，便成一家之言，占据一席之地，横溢的才华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在五霸七雄威盛的春秋战国，前方急于攻城略地，后方忙于招募人才。

独特宇宙观产生的社会治理观

——中国文明的三观智慧（二）

□ 段清波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使社会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运转，统治阶层通常会通过实践探索，创建出一套反映其意志、具有普遍约束力且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观。为了使社会能平稳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有关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即宇宙观，以及在其指导下产生的思维方式。同时，为保障社会治理有效运行，还需要构建一套能反映出人与人在相处过程中的最大共识，即核心价值观及其反映的行为处事方式。历史的实践证明，若三者能和谐运转，那么该阶段的社会秩序就相对稳定，反之则动荡。

王制和帝制的治理依据是根据宇宙观中“君权神授”说产生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与“择中”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与遗存。帝制时代，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处事方式无所不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切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根本。社会治理体系是指各种社会共同体在形成合作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礼、法等手段，为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而实施的政治制度、管理组织和与之配套的支撑体系。它的不断构建和瓦解是为适应社

会在发展中面临的不同挑战而变化的，其构成特征也成为任何文明形态最根本的特征。

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的分封制和以地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两大阶段，前者实施的是王国体制，后者实施的是帝国体制，虽然两者间有质的区别，但其依据均产生于宇宙观中的“君权神授”说。

中国文化从“满天星斗”逐步演进到“中原一支独秀”的态势，随着上古时代农业社会的观象授时的出现和发展，中国文明开始萌芽。在这一过程中，盖天说对古代中国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影响深刻。立表测影是盖天说成立的基础实践，“北极之下天地之中”的“地中”是盖天说理论的自然推论，并成为世俗生活中一处神圣的地点——在此可以受命于天。“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因“择中而立”观念的逐渐得到认可，各酋邦也纷纷通过“择中”这一活动来体现号令天下的做法成为必然选择。正因为龙山时代晚期“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才有了颛顼在中原大地上率先开展的“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才由此开始进入文明阶段。

处于分封制下的王国文明经过夏商

时期的发展，于西周时期得以成熟。中心城市、文字、高等级建筑等的出现自然是文明的表现，但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标志不应该仅是这类物化的因素，而应该是与“择中”这一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与遗存。王制时代的社会治理理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们依据和王之间的血缘关系远近、姻亲关系以及功臣和上古圣王后裔等作为标准，从王那里获得土地，人们的身份高低也只决定于血统。此阶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官殿和陵墓规模，各级墓道多寡，随葬器物等级、类别、数量以及规格等，都是在“礼”这一核心价值观约束下以及各社会阶层行为处事方式下的产物。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天子之宫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生活中处处均体现“礼”的约束。

经过不断的理论争鸣和社会实践，秦代以中央集权郡县制为标志的帝国文明，取代了之前的王国文明。郡县制萌芽于战国时期，形成于秦始皇时期，完善于汉武帝时期。以地缘为基础的皇帝专制下的郡县制，执掌地方的官吏由中央皇帝直接任免，其在辖区内只行使行政管理权，主要负责管理百姓、收取赋税和征发兵役和徭役等。此阶段的一切官吏的权力均来源于皇帝的赋予，采取

郡县制也是为了消除因分封制存在的割据隐患，使皇帝能够直接管理地方，从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而皇权则是来自至高无上的“天”，作为天子的皇帝是所有权力的中枢和中转，这一时期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处事方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规”“矩”意识无所不在。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国古代文明也因此面临着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冲击和挑战。180年来，历代前贤们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套新型的社会治理观，使之能够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和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类需求，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仍在不懈努力中。



□ 石志刚

古人的尽忠勤勉

中国古人尤其是古代官员，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抱有一份自己的理解。很多人秉承着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工作态度，他们勇于担当、敢于破例、公正待人、工作充实，这些态度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从事具体的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勇于担当

古代官员在工作过程中，不因职位变化而改变对工作的热爱和职守，这里面关键是有担当精神作为支撑。清朝有个官员叫严如煜，年少好学，胸怀大志，时人称其有经世之才，足当大用。他在不同岗位上爱岗敬业，富有担当精神，干出了实绩。乾隆晚年，武备松弛，贵州苗族作乱。朝廷派云贵总督福康安讨伐，湖南巡抚姜晟配合福康安作战。“独留心兵事”的严如煜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为姜晟草拟《平苗议》十二则，“言剿抚防御之策甚备”。严如煜所提之策内含中国兵家以修文德感化之精神，通过感化苗族世仇仇佬人，以之策应，取得阶段性胜利。嘉庆年间，严如煜

补授陕西西安知县。上任之后的严如煜首要之急在于剿灭给百姓生产生活安全造成极大危险的匪患。严如煜采取坚壁清野之策，制定游击战，“贼锋锐，勿迎击，俟其无所掠必去，去则出奇抄其尾，视其夕顿处，多方扰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不久，严如煜一举平贼之乱，“得旨加知州衔，赏戴花翎”。“劳于治民，拙于事上”是严如煜做官的风格，这个为官风格使得“十年不得调”，但他仍然认真履职，“益恳飭吏治，勤民事”，没有因为职位得不到提升而抱怨、懈怠。然其口碑和才华在民间和政坛不断累积，在道光年间，其治绩大显，得到其他地方大员夸赞和赏识，进而被提贵州按察使。然正当才华在更大平台上施展之时，不幸因“微疾”而去世。严如煜去世后，老百姓非常悲痛，“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严如煜在不同岗位上都认真履职，保持担当精神，作出了实绩，得到了百姓认可。

敢于创新

习斋在《言行录》中告诫学者

应当担起创新的责任：“学者须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即日新之学也。”学习之道如此，官员治国之道亦如此。西汉名臣龚遂被推荐主政渤海郡，渤海郡盗贼丛生，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龚遂来到渤海郡之后，没有延续以剿为主的对盗贼的策略，而是选择思路和工作创新的方式，采取以攻心为上的方法，基于对生活不下去的苦难群众被逼为盗贼这个事实的深入了解与洞察，作出了留出悔改时间、让盗贼去做正当职业的决策，取得了成效，不仅化解了盗贼之患，还赢得了群众支持，促进了社会进步。

公正待人

保持公正的工作风格，按照法律规定，惩治恶人，虽然会遭到一时误解，但是从国家长远发展考虑，仍然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汉光武帝刘秀的门吏蔡遵随刘秀转战河北，被任命为军队中的执法官，负责军营的法令工作。当时刘秀的

亲戚中有一个年轻人违反军纪，被蔡遵依法处死。当时，刘秀非常生气，打算收监蔡遵。主簿陈副对刘秀谏言道：“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刘秀听后，转怒为喜，封蔡遵为刺奸将军，告诫诸将，蔡遵连刘秀的亲戚都敢依法处置，必定不会徇私于你们。蔡遵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按照法律规定，对违纪违法之人进行有力惩罚，体现出他一视同仁、敢于执法的鲜明作风。这种作风为刘秀统一全国提供了必要的权威基础。

工作充实

保持充实的工作状态，不能选择清闲的工作状态。日则敬业，夜亦不歇，成为许多古代官员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南朝的傅翊工作辛劳、治政有方。别人请教他治政成功的秘诀。傅翊回答：“唯勤”而已，“勤则事无不理”。傅翊可以说抓到了治政成功的根本。又如唐朝名臣韩晃，当他听闻唐德宗被赶出

长安时，自己“负米一石登舟”，亲自运输粮食，可谓勤臣之典范。

杨联陞在《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中对晚晴曾国藩每天兢兢业业、辛勤繁忙的工作状态非常赞赏。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制定了自己的工作时间表，工作表中上半日工作内容包括：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下半日工作内容包括：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钱账目。夜间工作内容包括：温诗和古文、核批札稿、查应类事目。充实的工作生活会带来工作业绩的提升，反之，如果选择清闲的工作状态，会产生放逸的行为后果。正如颜元所说：“人之心不可闲闲，闲则逸，逸则放。”

